

山西粮食史话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粮食史话

主 编	武昌祺
副 主 编	侯欣珪
编写人员	张贵有
	徐子涵
	白 哲
	张文斌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粮食史话

武昌祺 侯欣珪 主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南郊四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字数: 180 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

ISBN 7—203—00685—9

F·87 定价: 3.00元

序

《山西粮食史话》是一部很好的历史资料。该书向读者展现了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山西的人口、土地、粮食生产、灾荒、收购、分配以及历代政权对粮食施行的不同政策等情况，对于我们今天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是极为珍贵的史料。

常言说：“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正因为此，无论那个朝代，都把粮食问题作为安邦治国的重大问题，把粮食的生产、储存、运输、交换、分配等等，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当然，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所采取的方针、政策也各别。无论怎么变，纵观历代粮政，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虽然有时也采取一些便民措施，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人民群众是难以受益的。从春秋以后一直到清王朝，我省在粮食方面总的特点和规律是：轻徭薄税，农业发展，各业兴旺，王朝兴盛；横征暴敛，遍地灾荒，农民起义，朝代更换。

我省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粮食生产、储藏、交换、加工等各方面的实践中，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对此，应当很好总结、研究、按照去粗存精的原则，加以利用和发展。

本书对以下两部份作了重点记述：一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粮食政策对敌粮食斗争和粮食事业发展壮大的状况，反

映了粮食工作 in 支持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二是阎锡山统治山西时期在粮食问题上的横征暴敛以及日寇侵略者掠夺山西粮食的活动。通过这些重点记述使读者更加充分地了解我省的近代粮食史,以及它相关联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况。通过对粮政变迁的了解,使读者加深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推动我省粮食的经营管理,更好地为城乡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服务。

武昌祺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目 录

第一章 建国前的山西粮食生产和粮食占有.....	(1)
一、土地占有 极端悬殊.....	(1)
二、粮食产量 停滞不前.....	(3)
三、粮食占有 极不合理.....	(8)
四、封建掠夺 形式种种.....	(12)
第二章 山西的灾荒与储粮备荒.....	(21)
一、山西的灾荒及官府救灾.....	(21)
二、历代的储粮备荒.....	(30)
三、社仓制度.....	(37)
第三章 阎锡山政权的粮政.....	(42)
一、田赋征收.....	(42)
二、巧立名堂，维系统治.....	(46)
三、推行“平民经济”政策.....	(51)
四、官僚资本对粮食的垄断.....	(64)
第四章 日本侵略者对山西粮食的掠夺.....	(75)
一、实行粮食统购.....	(75)
二、对城市人口的配给.....	(86)
三、日伪粮食机构.....	(106)
第五章 革命根据地的粮食政策.....	(110)

一、发展生产 削弱封建·····	(110)
二、合理测算 征收征购·····	(115)
三、各个时期对敌粮食斗争·····	(132)
四、保障供给 支持革命战争·····	(139)
五、粮食储藏与运输·····	(148)
第六章 山西粮食价格 ·····	(153)
一、旧中国的粮食价格·····	(153)
二、抗日根据地的粮食价格·····	(157)
三、几种主要粮食价格·····	(163)
四、差价与比价·····	(178)
第七章 山西制粉工业 ·····	(186)
一、制粉工业的起源与兴衰·····	(186)
二、主要面粉厂的变迁·····	(194)
第八章 山西粮食商业 ·····	(208)
一、粮食商业的起源与兴衰·····	(208)
二、山西商品粮的流通·····	(216)
三、山西粮商的组织与业务·····	(221)
第九章 山西的油脂经营 ·····	(233)
一、油料产量及销路·····	(234)
二、油坊和油料加工·····	(242)
三、油商和油脂经营·····	(251)
附录：粮食斗秤 ·····	(258)

第一章 建国前的山西粮食 生产和粮食占有

建国前的山西粮食生产，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和耕地不合理的占有，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状态，而且粮食占有又由于历代统治级阶的横征暴敛和地主、资本家的农佃盘剥，使山西粮食生产和粮食占有造成了极端悬殊的状况。

一、土地占有 极端悬殊

土地是数千年来劳动的结晶，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山西土地状况，据有关资料记载，一三八六年（明初）全省有耕地4572万亩；一六六一（清顺治十八年）4078万亩；一八九二年（清光绪十八年）5047万亩。辛亥革命以后，废除了官田占有，但耕地面积并没有很大的发展。在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以前，山西的耕地一直保持在6000万亩左右。一九三三年，则下降为5050万亩。一九三四年最低降到4876万亩，一九三六年又回升为6510万亩。高低相差达1600多万亩，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较大。

建国前山西土地状况的特点，一是山地多，约占总面积的70%多，耕地面积较少；二是耕地中旱田地，水田少，丘陵、山坡地占有很大面积。一九三五年，实业志统计，全省共有水田面积161万亩，占农田面积2.8%。旱地面积为5551万亩，占总面积的97.2%。在旱地面积中，平地占总面积的39.28%。山坡地占总面积的48.51%，荒芜地占总面积

的0.86%，其余则为河滩和碱地。到一九三六年，山西的水浇地虽然增加为279万亩，但也只占农田面积的4.29%。

三是耕地分布极不平衡，按县区划分，一九三五年调查，耕地在100万亩以上的有大同等六个县；在50万亩至100万亩之间的有榆次等四十四个县；在50万亩以下的有祁县等五十五个县。按农户划分，一九三五年调查，全省共有农户1829836户，每户平均四点八人，平均耕地31.2亩，每个农业人口约有耕地6.85亩。但不同地区耕地极不平衡，土地质量也不相等。辽县（今左权）为最高，每个农户平均142.8亩。平顺县最低，只有8.3亩。每个农户的土地，在10亩以下者有四县；11亩至20亩之间者十九县；21亩至30亩之间者二十七县；31亩至40亩之间者二十七县；41亩至50亩之间者十县；51亩至60亩之间者三县；61亩至70亩之间者四县；71亩至80亩之间者六县；81亩至90亩之间者二县；91亩至100亩之间者一县；100亩以上者四县。耕地分布的不匀，影响到一些地方的精耕细作和粮食单产的提高。四是土地占有很不合理。这是历代剥削阶级造成的。秦时商鞅废“井田”开“阡陌”，田归私有，对当时的生产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由于土地的兼并，却形成了“富者田连阡陌，贫无立锥之地”的状况。汉时改为“限田”，新莽时变为“均田”，晋又改为“占田”。唐改为“班田”，宋时改为“授田”“职田”“方田”。清代又将土地分为官田和民田。虽然历代统治者对土地的占有进行了多次改革，但由于剥削制度的存在，多数土地一直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一八九二年，山西的官田高达148.9万亩，占到耕地总面积的30%。到了民国年间，虽然废除了官田制度，但大量土地又为官僚、地主、资本家所占有。据中国实业志记载，一九三五年统计，山西全省1829836

个农户中，占有土地的自耕农1055186户，占农户总数的57.67%；缺乏土地的半自耕农390034户，占农户总数的21.64%；佃农207814户，占农户总数的11.36%；雇农170802户，占农户总数的9.33%。冯和法编著的《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中记载，一九三五年山西1630225个农户，占有耕地4668.3万亩的调查看，有耕地100亩以上的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3.78%，而耕地占有数却达到总耕地的22.01%。耕地十亩以下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7.07%，但耕地占有仅为耕地总数的7.91%。据中共山西省委对原太行、北岳、晋绥解放区的典型调查，一九三六年地主占总户数的3.6%，占有土地29.5%；富农占总户数的7.2%，占有土地21%；中农占总户数的28.4%，占有土地29.5%；贫农占总户数54%，只占土地19%；雇农占总户数的5%，仅占土地0.8%。

上述比例，与当时全国的平均占有比较（地富占有土地70%—80%），山西的土地虽然还不算十分集中，但地主、富农掌握了多数肥沃耕地，控制着农村粮食生产的经济命脉。据平顺、昔东（昔阳）的几个村庄统计，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分别占有好地的比例为：40%、20%、15%、12%。

由于大量土地和肥沃耕地，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粮食生产的长期停滞不前。

二、粮食产量 停滞不前

山西粮食产量，民国以前缺乏完整统计，到民国初年才有了粗略记载。但数出多门，很不一致。经反复核对，摘出了以下（表1—1）八年的粮食产量：

上述数字可以看出，山西粮食产量停滞不前，长期徘徊

表 1—1

年 度	粮田面积 (万亩)	产 量 (千市担)	折合现市斤 (万斤)	亩 产 (现市斤)
1914	5704	45782	457820	80
1916	6045	64686	646860	107
1931	5020	50512	505120	100
1932	5099	61185	611854	120
1933	5050	59561	595610	118
1934	4876	59993	599930	123
1935	5026	61929	619291	123
1936	5400	67348	673485	125

在六十亿斤左右。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三六年的二十年中，粮食产量只增加了26.625万斤，年均增长幅度仅为0.2%，平均亩产净增18斤，年均不及一斤，而且各年之间又不稳定。造成上述原因所在，主要是由于土地的不合理占有和阎锡山连年扩军备战以及无休止地对农村掠夺所致。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掠夺、破坏和抢劫，粮食生产更遭严重破坏，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据日伪政府“统计年鉴”记载，一九四〇年在日伪统治的53个市县中，粮食产量只有174,960万斤。每个市县的平均数还不及3300万斤。粮荒严重，民不聊生。

一九四五年，阎锡山回到太原以后，更加紧了对粮食的掠夺，在其施行的一系列苛政之下，粮食生产不仅得不到恢复，反而每况愈下。一九四六年的粮食产量尚可达到656,356万斤，一九四七年则降为579,800万斤。亩产98斤。还低于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粮食生产水平。

附以上各年粮食分品种产量。（表1—2, 1—3, 1—4）

表 1—2

年度	合 计				稻 谷				小 麦			
	粮田 面积 (千亩)	产 量 (千担)	折 合 现 市 万 斤	亩产 (现市 斤)	粮田 面积 (千亩)	产 量 (千担)	折 合 现 市 万 斤	亩 产 (现市 斤)	粮 田 面 积 (千亩)	产 量 (千担)	折合现 市万斤	亩产 (现 市斤)
1914	57040	45782	457820	80	5468	2595	25950	47	12611	15117	151700	110
1916	60453	64686	646860	107	4578	3884	38840	85	11853	36570	365700	309
1921	50205	50512	505120	100	112				17123	13185	131850	177
1922	50990	61185	611854	120	112				17750	16685	166850	94
1933	50500	59561	595610	118					14520	15741	157412	108
1934	48760	59993	599936	123								
1935	50260	61929	619290	123	115	127	1270	375	15537	16587.6	165876	107
1946	57689		656356	112	257	260	2600	101	18307	15911	159110	87
1947	48810		579800	98	150	113	1130	75	18380	17720	177200	97

表 1—3

年度	谷 子				玉 米				高 粱			
	粮田面积 (千亩)	产 量 (千担)	折合现市 万 斤	亩产 (现市 斤)	粮田面积 (千亩)	产 量 (千担)	折合现市 万 斤	亩产 (现 市斤)	粮田面积 (千亩)	产 量 (千担)	折合现 市万斤	亩产 (现 市斤)
1914					1745	2120	21200	112	5266	4565	45650	80
1916					1413	3049	30490	215	14027	12082	120820	86
1931	12639	15420	154200	121	4189	4901	49010	117	7890	9074	90740	122
1932	12410	16754	167540	135	4110	5918	59180	144	8814	13045	130450	148
1933	11490	13966	139662	122	255	4919.9	49199	146	634	7118	71180	112
1934												
1935	12775	18724	187240	146	3570	5628	56280	158	6922	10543	105430	150
1946	22325	25904	259040	116	6530	10569	105690	162	3907	6407	64070	164
1947	19870	22456	224560	115	6330	5954.7	59547	94	3360	3119	31190	93

表 1—4

年 度	豆 类				其 它 粮 食				薯 类			
	粮田 面积 (千亩)	产 量 (千担)	折合 现市 万斤	亩产 (现市 斤)	粮田 面积 (千亩)	产 量 (千担)	折合现 市万斤	亩 产 (现市斤)	粮田面积 (千亩)	产 量 (千担)	折合现市 万 斤	亩 产 (现市 斤)
1914					31945	21385	213850	67				
1916					28582	9101	91010					
1931					7991	7456	79560	100	261	2380	4760	182
1932					7510	8246	82460	109	254	2687	5374	207
1933	508	4249	42498	83	1063	135659	135659	128				
1934												
1935	3585	3543	35430	99	6547	4642	46426	71	1232	1916	19159	155
1946	3014	3138	31380	104	2623	2512	25120	95	726	934	9346	133
1947	4880	3643	36434	74	5110	4046	40460	79	730	927	9279	121

1. 为统一计算, 对原资料以小米计产者, 均统一为谷类计算, 每七十五斤小米折顶谷类一百斤。

薯类以五斤顶粮食一斤; 2. 旧秤折合现市秤均以现市秤119斤折旧秤一斤计算; 3. 对产量以石为单位者, 其折算办法均以1947年5月2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的粮食分品种标准计算之; 4. 1916年以前稻谷产量面积, 含谷子产量面积。

三、粮食占有 极不合理

(一) 人口的变化

人既是粮食生产者，又是粮食消费者，粮食的占有是以人口变化为主要依据的，因而历来总是把人口的发展与土地的垦治、粮食的增减联系在一起。据历史记载，战国时期，秦国开发巴蜀，楚国开江淮，秦汉统一，因而有两汉人口的上升。汉平帝公元二年，全国垦田面积达720万顷，人口增到五千万以上。唐经济发展，人口上升，最多时超过六千万人。元、明、清三代建立之初，由于战乱，人口曾大减。清朝统治者，采取了恢复农业生产，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政策，到了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全国人口突破了一亿四千万人。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使乾隆也忧虑起来。他说：“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主张“非野无旷土”。他的这个主张，就是要用开垦荒地，地尽其利的措施来适应人口的增长。

山西的人口，从一八四〇年到一九三九年的近百年中，其间发展，虽经波浪起伏，但全省人口总数并未上升。据中国实业志记载，一八四〇年全省人口为1489万，经过三十五年之后，到了1876年（光绪二年），人口总数增为1641万，成为当时的顶峰，此后，则开始连年锐减，到一八八三年减到1074万，以后的二十八年中，虽稍有回升，但最多的时候，也只有1100万左右。到了一九一二年全省人口降到当时的最低点，成为1008万。民国初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全省人口始终徘徊在1100万上下。

山西人口在这一阶段，所以发展缓慢，一是—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战乱、兵祸不

断，加上官府压榨，封建势力的掠夺，造成民不聊生；二是接连不断的严重灾荒，形成了人口的大量流亡。山西在历史上旱灾较多，尤其是一八四〇年至一九三六年的九十六年中，全省发生面积较大的旱灾就有十六次，其中有几次大灾，已经造成“赤地千里，人口流亡，道殍相望”的严重局面。一八七七年就是“大稷”之年。据夏县县志记载：“光绪元年秋旱，二年又旱，三年大旱，二麦不登，赤地千里，树死土焦”。因而人口的流亡，非常严重。对此，李用清在《大荒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述：“光绪三年，山西无处不旱。受灾极重者八十余区，饥口入册者，不下四五百万，死者十有五六，壮者多散之四方。芮城环城数十里，绝少居民，农村十室九空”。此次大灾之后，全省人口大幅度下降，从一八七七年开始，到一八八三年的六年中，就减少了569万。

之后，一八九一年灾，一九〇〇年大灾。受灾面积波及太原、临汾、长治三区。对灾荒的程度，在山西旱灾史料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一九〇〇年（光绪26年）旱灾，五谷欠收，饥死民甚多，绛县六万人，灾后只剩三万余口”。这次灾荒，又不同程度的造成了人口的流亡。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旱灾，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九年又灾。灾后粮食减产，灾民得不到赈救。经常处于流离失所，啼饥号寒的境地。因而，全省人口在一九二九年（民国18年）曾一度达到1200万以后，到了一九三六年又下降为1147万。

（二）粮食占有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三六年，人均产量1931年为最低，只422斤。一九三六年最高为587斤。当时的人均产量如下表（1—5）

单位：万斤

表 1—5

年 份	粮食总产	人口总数 (万人)	人 均
1914	457820	1044	438
1916	646860	1053	614
1931	505120	1197	422
1932	611854		
1933	595610	1130	527
1934	599936	1162	518
1935	619290	1133	528
1936	673485	1147	587
正常年景	659700	1197	551

但如前所述，在旧制度下，农民生产的粮食大都为官僚、地主、资本家所占有。从秦汉到民国，相继建立的封建等级制度、井田制度、粮长制度、田赋制度，使农民生产的粮食都掌握在官府豪门的仓廩之中，因而抗日战争以前的商品率和农民粮食消费水平是很低的。

当时的粮食商品率，据山西经济资料记载的中共山西省委调研组对临县、应县、宁武、城关、洪洞曲亭、运城媚阳、黎城上遥、祁县贾令所属四十四个自然村一九三六年情况的调查，粮食总产值为108万元（已折成现人民币），出售总值为18万元，粮食商品率只有17.36%。

农民消费水平，极为悬殊。据中共山西省委调研组对一九三六年分阶层人民生活的典型调查，当时年平均消费粮食水平453斤，代食品（包括油饼、糠夫、豆腐渣等）每人平均6斤。其中贫雇农生活水平最低，年平均消费粮食386斤，